

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钮婉姮

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兰州 730070

摘要:文章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出发点,分析了“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之所以困难的原因,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就专家学者在普及古代典籍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 古代典籍 历史 逻辑

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博大精深;这一公认的事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来说,颇能振奋民族自信心。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历史越悠久、遗产越丰富,对于相应文化的继承人来说,越难在继承中获得发展的动力,丰富的文化遗产很容易变成沉重的历史包袱,从而大大降低文化创新的能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于正在全力实现现代化、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当代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难问题。

总得来看,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是单一的汉族历史,而是包含着同属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历史,所涵盖的地域纵横数万里,不仅有诸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有汉字自身演变的历史;其次,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也是差异极大,各民族各地域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不仅自身不断地变革而且彼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所有这些,对于想要全面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因眼前迷雾重重而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遗传密码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解读和传递的信息,否则文化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毫无疑问,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另起炉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印度不可能完全照搬英国的原因,现代化的本质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是文化借鉴与创新的起点,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解读,主要途径来自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等的认识与解读。这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现代人对古代典籍、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等的认识与解读是否就符合相应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对此,不能妄下结论。

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对此古人也早有认识。像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一》中就说过:“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郑樵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不在于所说的道理不明(理意),而在于所描述的对象(事物)难明,也就是说典籍的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并不见得符合历史的原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戴震所强调的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一听就懂的事物,后代的国学大师转相考证都还不明白,所以后人读古书,不仅“事物难明”而且也往往“理意难明”。

概括来说,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之所以困难,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 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典籍,以文言文为主。文言文的语词结构与现代汉语的语词结构截然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词、语法本身的演变,现代人对文言文的语词所表述的内容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只有对文言文的语词进行深入的语义学研究、科学地界定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才能科学地把握古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一个语词,它都有可能与古人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因而这个语词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语义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说,“风流”这个语词,古代有时是指风俗教化,有时是指风化流行,有时是指个人的仪表文采,有时则指行为不拘礼法,等等,可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而现代多指男女之间有着较大随意性的交往。如果不明白语词随着历史演变有不同的语义,只是以今律古、执一以求,想要读通古书了解古人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文言文语词的解读始终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不进行“动态”的语义

学的分析研究,那后人对古代典籍的解读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古代典籍作者的原意。王国维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曾直言说自己读《诗经》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懂,分析其原因主要为:或因字句有“讹缺”,或因“古语今语不同”,或因古人“颇用成语”,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王国维阅读古籍所感到的这些困难,其实就是文言文的语词、语法的历史变迁造成的,所以专门研究古代汉语的语词和语法的历史演变、准确把握文言文语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确切语义,是解读古代典籍的重要环节。恰恰在这方面,目前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对古代汉语的语义学研究还很不充分。

(2) 由于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自身的演变发展,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现代人很难体会。比如,像《国语·晋语》中写骊姬乱晋时,太子申生虽然知道骊姬的用心,却因为怕他父亲晋献公伤心,既不敢揭发又不敢逃亡,最后白白送死;这样的“愚孝”,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再比如,像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写郑生为李娃抛弃功名,沦落市井之中唱挽歌时被父亲发现了,其父认为有辱家门,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丢在路旁;这样的“亲情”,现代人也会难以认同。但是,这些事例都是与相应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与当时的孝道观、社会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出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结论,也就是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的高度统一。正是由于古今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的巨大差异,现代人阅读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时必须对这些典籍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特定历史环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否则就会用现代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去“苛求”古人,无法理解古籍所表述的内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人应该完全“认同”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文化继承是以文化批判为前提的,全面深刻地认识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正是为了客观地认识古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历史作用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从而继承思想方法、道德观念中进步的内容扬弃反动的内容,而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的进步正是依靠这样的批判与继承才使传统文化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历史越久远的越需要有现代化的、全面的诠释,这不仅是语词的准确翻译(也就是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还包括时代背景的客观介绍以及与时代背景并存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只有这样,现代读者才可以从语义、时代背景以及思想方法、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完整准确地领会古籍的内容,进而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来说,应具备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义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并能有效地运用广博的知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的高度统一”。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要研究国故,必须具备“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懂得如何“整理”。在形式方面,要把古书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分开段落章节;在内容方面,要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就目前而言,对于古代文献特别是文学文献加以现代化的整理疏释的方法,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译注,重在翻译或注明音义;二是论评,重在阐发道理或评介事物。这两种方法,古人皆已有之,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论译。换句话说,要现代人都看得懂。这就是需要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还原古代典籍的“本来面目”,对“原汁原味”的古代典籍进行注释,进而将古代典籍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使古代典籍得到推广和普及,使现代人想要阅读古籍,通过阅读古籍认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得到启迪和提高。唯有如此,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才可能把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文明遗传密码转换为现代信息,不仅使广大的普通读者受益,也使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为文化借鉴与文化创新开辟广阔的远景。

参考文献:

- [1] 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戴震,戴震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74
- [3] 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忠经·孝经白话精解,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钮婉姮,女,1965年生,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古籍部主任。